

战前日本的中国观与“共同体”理论

祁建民

内容提要 “共同体”理论是战前日本中国观的核心部分。自 20 世纪 30 年代这个理论传入日本之后便成为当时日本认识、研究中国问题最流行的理论。但是，受军国主义政策的影响，“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却演化成“中国社会停滞论”。这个观点不但从理论上支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厌恶、蔑视感情，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之一，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拥护和宣扬。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中国认识深层次里依然还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停滞论”和“专制论”观念。

关键词 战前日本 中国观 “共同体”理论 日本侵华战争

在战前日本，由“共同体”理论而演变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严重助长了其蔑视亚洲各国、主张侵略有理的观念。较之于“皇国史观”赤裸裸地宣扬皇国至上、侵略有理的手法，“中国社会停滞论”则披着一层“学术性”外衣，有理论有“根据”地主张对外扩张是合理的、必要的。至今日本仍有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支持或继承了这种观念，为过去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依然对中国持有偏见。

当然，在战前的一个时期，虽然“共同体”理论和“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工具，不过有些关于“共同体”问题的研究也并不都是直接为侵略战争辩护的，仍然属于学术性的探讨，这也正是清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所在。本文主要是对战前日本“共同体”理论的引入和演变状况进行初步总结，重点分析由“共同体”理论所演化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是如何形成并支持其发动侵略战争的。

一、“共同体”理论与“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形成

“共同体”理论最初源于欧洲。早在古希腊时期，经过希腊波斯战争，古希腊人就形成了希腊是自由民按照自己制定的法律而管理的国家，而亚细亚（当时是指波斯，其后欧洲人所指的亚细亚范围扩展到东亚地区）则是来自神权的君主与其所隶属的奴隶一样的臣民所构成的世界。这就是在欧洲人心理上长期存在的欧洲是“自由”世界，亚洲是“奴隶”社会的传统观念。^①到了 18 世

^① 岡崎勝世『世界史とヨーロッパ』、講談社、2009 年、18—19 頁。

纪的西欧,当时的思想家们基于欧洲绝对王权主义盛行的社会现实,为了打破对市民社会的束缚,便借助对“野蛮的亚细亚专制主义”进行严厉批判来宣扬近代市民社会的理念。他们为了说明亚细亚的专制和落后,便从土地公有这一经济基础上进行分析,认为亚洲社会的特征是土地属于专制国家所有,没有独立的市民阶层存在,因而无法限制王权的专制统治,所以社会发展停滞。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从政治体制上论证了东方“停滞”的原因,他认为由于亚细亚(这时欧洲提到的亚细亚主要指中国和印度)自古就是专制政体,是以人的隶属关系为基础的,因而其文化就没有进步。他还从自然气候上解释为什么欧洲会与亚洲不同。^①黑格尔则认为由于东方世界皇帝专权,没有对立面,因而不会进化。^②亚当·斯密从其近代经济学理论出发,在与欧洲比较中论证了中国经济的停滞性,认为18世纪的中国社会与500年前马可·波罗所描述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③显然,这些都是从自己的主观臆断出发来评价和描绘亚洲社会的。到了19世纪后期,西方又把“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看作是家长制的共同体。^④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也把中国社会看作是不同于西欧历史发展原理的另一种社会。^⑤

但是,对于当时东方社会的具体结构,不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黑格尔等人,都仅仅是依据东方古典文献和一些欧洲传教士带回的资料,停留在抽象的一般论述上。特别是他们往往从欧洲中心主义出发,在对亚洲的认识上带有偏见。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角度客观研究亚洲社会历史的始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在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流亡到伦敦,他利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英国在印度为推行殖民统治所调查、整理出的资料对印度社会进行了详细研究。

马克思认为当时的亚洲处于原始共同体的最终阶段即“农耕共同体”阶段,土地归共同体所有,而这种原始共同体是各个民族历史上都存在过的,由于亚细亚社会共同体没有彻底解体,所以其上层建筑就是专制国家政体。^⑥马克思并不是从欧洲的偏见出发,而是要从所有制和共同体这种经济社会结构来分析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不过,这时的马克思对于东方社会的认识也受到文献资料的局限,还只能是一种假说。马克思晚年曾准备系统研究东方社会,可惜天不假时。

后来的西方学者根据新得到的有关印度的详细资料,对于共同体的看法发生了变化。1923年,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以前欧洲人所说的亚洲原始农业共同体不过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租税负担性的连带组织。^⑦20世纪80年代又有日本学者根据对印度历史的深入研究,详细分析了当时英国殖民当局的调查资料,对于西方学界有关亚细亚社会共同体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整理,明确指出当时所认为的那种共同体只不过是殖民地当局为了保证向印度农民榨取沉重的税收而实行的一种征税连带责任制度,与所谓的原始共同体没有任何关系。^⑧

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本来是从人类根本解放的角度,在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探讨时所提出的一种假说。但是,这一假说却在后来被人们或是出于教条主义的解释,或是出于自身的价值判断而不断地加以推测、发挥或任意利用、曲解。特别是在战前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共同体”理论被引入后则演变成支持对外扩张的理论。

① モンテスキュー著、野田良之他訳『法の本質』、岩波書店、2008年、第2、14頁。

② ヘーゲル著、武市健人訳『歴史哲学』、岩波書店、1980年、第1部第1頁。

③ アダム・スミス著、大内兵衛訳『国富論』、岩波書店、1954年、第1編第8章。

④ 島恭彦『東洋社会と西欧思想』、生活社、1941年。

⑤ マックス・ウェーバー著、森岡弘通訳『儒教と道教』、筑摩書房、1970年。

⑥ 参見小谷汪之『マルクスとアジア』、青木書店、1979年。

⑦ 北原淳『共同体の思想』、世界思想社、1996年、29頁。

⑧ 小谷汪之『マルクスとアジア』、小谷汪之『共同体と近代』、青木書店、1982年。

一般认为,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形成始于1922年,以佐野学的著述活动为标志。^①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日本历史学界,当时最受推崇的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共同体”理论。按照这个理论研究中国和亚洲一时成为显学,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是由当时的国际背景和日本的自身条件所造成的。

20世纪20年代末期,当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之后,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在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曾引起激烈争论。这与苏联发生的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围绕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问题上展开的争斗有直接关系。1931年,在苏联的列宁格勒,由“列宁格勒东方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者会议”主办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学术讨论会。当这个会议的综述介绍到日本之后,立刻引起了日本学界的大讨论。^②列宁格勒会议的速记录由苏维埃马克思主义东方学者协会出版后不久,1933年其日文版便在日本刊行。^③“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共同体”理论立即成为处在亚洲、对中国研究有着深厚积累的日本学界,用以分析、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的最新锐的理论工具。^④虽然后来斯大林发表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五种社会形态作为人类历史的普遍发展规律,并没有再提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但对此日本学界却没有太大的响应,执着地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

1932年5月,以渡部义通、西雅雄、早川二郎为中心创办了《历史科学》杂志,其口号是“开拓无产阶级历史学,建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该刊陆续刊载了许多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文章,成为当时讨论这一学术热点的主阵地。格科夫斯基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发展》、魏特夫的《黑格尔的中国论》、高戴斯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讨论的总结》等在该刊陆续翻译发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后不久也都很快传到日本。例如,1939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文版刊行;1940年,其《资本主义以前各种社会形态》俄文版刊行;1941年,他的《古代社会笔记》出版。这些著作都很快传到日本,为学者们熟读。^⑤这就更加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便利了当时的研究和讨论。

但是,当时日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共同体”理论研究所主要依据的其实并不是马克思的著作本身,而是马扎尔和魏特夫的有关理论。例如,受马扎尔关于中国社会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观点的影响,橘朴和中江丑吉都认为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论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他们很快就运用这种观点进行了研究。^⑥《满铁调查月报》14卷2、3号曾刊登了马扎尔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所谓权威定义,这就是1.人工灌溉是农业的主要条件2.国家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3.其国家形态是东洋专制主义等。这种看法对日本学界具有指导性意义。

魏特夫及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当时日本最受追捧。魏特夫每有著作出版,几乎很快就被翻译成日文出版。特别是魏特夫的《解体过程中的中国经济和社会》一书被平野义太郎等翻译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该书企图进一步充实马克思的亚洲社会理论,提出由于大规模治水工程的需要产生了亚洲的专制国家政府,这标志着魏特夫式亚洲观的形成。其后魏特夫又在《东洋

① 北山茂夫「日本近代史学の発展」、尾藤正英、岩井忠雄、家永三郎他編『岩波講座世界歴史』別巻1、岩波書店、1963年。

② 石田浩「中国農村社会経済構造の研究」、晃洋書房、1986年、7頁。

③ ソビエトマルクス主義学者協会編、早川二郎訳『アジアの生産様式について』、白揚社、1933年。

④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青木書店、1976年、168—169頁。

⑤ 布村一夫「共同体の人類像」、長崎出版、1983年。

⑥ 橘樸「中国農村の階級構成」、『満蒙』第9巻第4号、1928年;中江丑吉「支那の封建制度に就いて」、『満鉄支那月誌』第8巻第1号、1931年。

社会的理论》^①中认为亚洲社会就是一种停滞的社会,这对以后日本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当魏特夫被纳粹德国政府驱逐后,于1935年来到日本,他与日本史学家和田清、石田干之助、清水泰次、仁井田升、牧野巽等人交流过井田制,以及中日儒学的差异等问题。不久,魏特夫在中国进行调查研究后所发表的新成果也在日本翻译出版。^②可以说,魏特夫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日本有着极大的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魏特夫访问日本时,通过对日本农村的“考察”后提出,日本与欧洲各国相似,虽然落后畸形,但从18世纪末具备了开始向产业资本主义进化的各种条件。这种观点深为平野义太郎所赞同并大加介绍。^③由此,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论调,这就是“亚细亚停滞社会”不包括日本,日本是一个特例,所谓“停滞社会”专门是指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诸民族。此后,日本许多学者认同并发挥了这种观点。由此便不难理解魏特夫的这一观点之所以受到追捧,就是因为这个观点与近代日本的“脱亚入欧”理念十分巧合。已经“文明化”的日本,对于亚洲其他国家带有一种强烈的厌恶和蔑视感情,亚洲社会“停滞论”恰恰又为这种感情带来了理论上的注解。

在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初创时期,运用“共同体”理论研究亚洲社会,最著名的当推羽仁五郎和服部之总。羽仁在1932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东方资本主义的形成》。^④羽仁认为,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奴隶制与农奴制同欧洲古代的奴隶制和中世纪的欧洲农奴制有着根本的不同,带有“亚细亚特殊性”,具有这种“亚细亚特殊性”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阻止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这样就陷入了“停滞的社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在亚洲从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转变时,由于阶级斗争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很不彻底,旧的残余顽强存在,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羽仁又说,日本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与中国、印度同样属于具有“亚细亚特殊性”的社会,但是,在幕末时期出现了资产阶级发展的萌芽和向绝对王政转换的因素。这就是说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与印度、中国不同。至于具体为何不同,羽仁没有进一步说明。此后,服部之总通过对幕末日本手工业的实证分析,认为日本在天保年间(1830—1844年)已经进入马克思所说的手工生产阶段,而中国是在甲午战争之前才进入这一阶段的。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说,服部认为日本落后于西方,但是又比中国和印度发达。^⑤

这期间运用“共同体”理论,针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少。如森谷克己在其论文《中国经济社会史诸问题》中认为,秦朝实行的什伍制是将原有的自然村落组织改变为专制国家的基础;郡县制是由国家直接统治生产者,因而秦朝是专制的封建官僚主义社会。^⑥佐野袈裟美在《中国历史读本》^⑦中,认为从西周到春秋时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时代,其后进入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秋泽修二在《中国社会结构》^⑧中提出,汉唐时代农奴制与奴隶制并存,王朝反复交替,社会结构分化发展缓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亚细亚停滞性的特征,所以阻止中国社会发展的原因就是共同体关系的延续和存在。不过,横川二郎在《中国的农村共同体及其遗存》^⑨中,批判了魏特夫的“水理论”,

① ウィットフォークル著、森谷克己、平野義太郎編訳『東洋社会の理論』、日本評論社、1938年、第1篇。

② ウィットフォークル著、平野義太郎、宇佐美誠二郎訳『支那社会の科学的研究』、岩波書店、1939年。

③ ウィットフォークル著、平野義太郎、宇佐美誠二郎訳『支那社会の科学的研究』、岩波書店、1939年、181—192頁。

④ 羽仁五郎『東洋における資本主義の形成』、『史学雑誌』43卷2、3、6、8号。其单行本1948年由三一书房刊行。

⑤ 服部之総『明治維新史研究』、白揚社、1933年;服部之総『日本史の世界と世界史の日本』、『世界』11月号、1947年。

⑥ 森谷克己『支那経済史・社会史の諸問題』、『歴史科学』3卷5号(東洋史特集号)、1934年。

⑦ 佐野袈裟美『支那歴史読本』、白揚社、1937年。

⑧ 秋沢修二『支那社会構成』、白揚社、1939年。

⑨ 横川二郎『支那における農村共同体とその遺存について』、『経済評論』2卷7号、1935年。

他认为大规模水利工程只是强化专制权力的次要原因,其主要原因还是“孤立的小宇宙式的共同体”。^①平田良卫则从“共同体”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革命。^②

1936年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日益盛行,特别是在《思想犯保护观察法》公布之后,加强了思想控制。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等讲座派^③学者受到监控。1936年12月,《历史科学》被迫停刊。1938年2月,以大内兵卫、美浓部亮吉等人为代表的劳农派^④也遭到镇压,由此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阵地便从日本国内转移到设在中国东北的满铁调查部这样的海外殖民地研究机构,其研究成果开始主要在《满铁调查月报》和《满洲评论》上发表。

这一时期虽有人对魏特夫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提出怀疑,但绝大多数学者还是支持的。例如,大上末广在《旧满洲的土地形态和地租形态》^⑤一文中,批判了“亚细亚社会停滞论”的观点,认为富农属于近代市民性质的土地所有者,中国农业正在向资本主义发展。清水盛光的《旧中国专制权力的基础》^⑥,虽然也批判了魏特夫的“水理论”,但他又接受了迪尔凯姆等的“环节社会”理论,认为中国社会是以村落自治体为单位的“环节社会”,个人被村落共同生活所吸收,缺乏政治要求的独立性,是一种典型的处于停顿状态的“环节社会”。佐藤晴生在《关于魏特夫的“东洋社会的理论”》^⑦和《中国经济史上的灌溉》^⑧等论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属于旱地农业,魏特夫的“水理论”不能成立,主张中国专制主义的基础是孤立闭塞的共同体。此后,满铁调查部研究人员对于中国古代农业技术进行了一系列考察,结果都是否定魏特夫的“水理论”。这方面的研究还有村上舍己的《关于华北农业生产力发展史的若干考察》^⑨、天野元之助的《中国农业中水的意义》^⑩等。另外,为了考察中国古代的共同体,牧野巽等人还对汉代的家族形态进行了研究。^⑪但是,他们的研究仅仅限于家族形态方面,未能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其讨论也没有得出重要的成果。^⑫

日本学界在研究中国社会的共同体的具体表现时,曾围绕里甲制的性质,以及其与自然村的关系展开过争论。山田秀二主张“里”是由国家编成的行政村。^⑬松本善海也认为里甲制是以110户为单位进行编成的,是国家为了征税组织的,属于行政村。^⑭但是,清水盛光在承认里甲制的行政村性质的同时,又认为它与自然村也是统一的,是由一村或数村联合而成的,是以自然村为基础,为了征税和维持治安以行政方法编成。^⑮

1937年日本学界围绕中国统一化问题的争论也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密切相关。西安

①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168—169頁。

② 平田良衛「支那革命と農業問題、三、アジアの生産方法」、『思想』86号(支那特集号)、1929年7月。

③ 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执笔、出版《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丛书而得名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组织,主张从打倒天皇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转变的“两阶段革命论”。

④ 日本战前由非日本共产党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构成的团体,以1927年他们出版的《劳农》杂志而得名,主张明治维新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认为当时即20世纪20年代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

⑤ 大上末広「旧満州の土地形態と地代形態」、『満鉄調査月報』13巻3、4号、1933年。

⑥ 清水盛光「旧支那における専制権力の基礎」、『満鉄調査月報』17巻2号、1937年。

⑦ 佐藤晴生「ウィットフォーゲル『東洋社会の理論』に就いて」、『満鉄調査月報』19巻11号、1939年。

⑧ 佐藤晴生「支那經濟史における灌溉」、『満鉄調査月報』20巻4号、1940年。

⑨ 村上捨己「北支農業生産力展開史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満鉄調査月報』20巻8号、1940年。

⑩ 天野元之助「支那農業における水の意味」、『満鉄調査月報』22巻8、10号、1942年。

⑪ 牧野巽「漢代における家族の大きさ」、『漢学会雑誌』3巻2号、1935年;宇都宮清吉「漢代における家と富豪」、『史林』24巻2号、1939年;守屋美都雄「漢代家族型体に関する試論」、『史学雑誌』52編6号、1940年。

⑫ 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東洋史学』、168—169頁。

⑬ 山田秀二「明清時代の村落自治について」1・2・3、『歴史学研究』2巻3、5、6号、1935年。

⑭ 松本善海「支那地方自治發達史」、中央大学、1939年。

⑮ 清水盛光「中国の鄉村統治と村落」、日本評論社、1949年。

事变发生后,矢内原忠雄发表了《中国问题的所在》^①,指出在南京政府领导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取得进展,近代统一国家正在形成,并正在摆脱半殖民地的状态,意在说明中国也在发展。但是,大上未广、土井章、中西功、尾崎庄太郎、尾崎秀实等马克思主义学派历史学家,在对中国的统一化和经济建设的评价上与矢内原忠雄的观点有所不同,出现了论争,并在论争中都涉及了“亚细亚社会停滞论”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②特别是大上未广、中西功等具有参加满铁调查部农村调查经验的人,虽然对中国农村从动态的、发展的观点进行了一些分析,对于战后日本的中国农村研究影响很大,但他们对中国农村的研究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通过农村土地所有的规模和土地经营,考察阶级构成,并与中国革命运动相联系,所以他们对农村经济结构的具体状况依然分析不足。^③

在战前日本,根据“共同体”理论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全面并且深入研究的当属清水盛光。^④清水在其巨著《中国社会研究》^⑤中,认为中国政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绝对专制主义,而绝对专制主义的客观基础就是由于中国分散、孤立的村落共同体的存在,这种村落共同体构成了迪尔凯姆所说的非近代的“环节社会”。近代西方社会是由于“环节社会”的解体、分工出现,产生了基于平等思想的自由独立的个人,由此结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然而,在中国由于个人完全被村落共同体所吸收,无法产生平等思想,不但没有出现市民阶层与社会,反而成了专制主义的社会基础。在清水看来,中国的专制主义与西方前近代的社会性质是一样的,都属于“环节社会”。

清水根据当时所能掌握的文献资料,对中国村落进行详细研究,认为当时的村落内部已经出现阶级分化,是由乡绅、士绅统治的社会,这是一种氏族共同体的残存形态即同族部落。这种村落社会进一步分化、解体,便成为异姓杂居的地缘性村落,即使是作为村民共同事业的看青活动也就带有了阶级性。但是,他又认为即使在阶级社会中,中国村落的独立性也是依然存在的。清水还主张中国的共同体村落同时存在着两种自治,一种是由村落首长介入的政府对村落的统治,清水称其为“他律的自治”;另一种是作为前一种自治基础的,在村落内部自行产生的自治,清水称其为“自律的自治”,后一种自治存在的依据就是村落共同体的性质。虽然由于阶级分化,村落的共同体性质被逐渐破坏,但共同体的因素也对阶级分化产生了阻碍作用。

战前日本学界根据“共同体”理论对于中国的研究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争论,甚至也有人批判魏特夫的“水理论”,但他们都把共同体当作东西方历史上共同存在的社会形态,把东方专制主义归结为共同体依然存在结果,认为中国社会具有停滞性。这种想法在当时非常普遍,正如丸山真男所说“中国的停滞性是当时站在第一线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多多少少都共有的一种认识。”^⑥这种观念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因为东方专制主义的概念及其理论是近代西方学者首先提出的。正如中村哲所指出的,“专制主义的概念是近代欧洲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作为发展中的自由的欧洲市民社会的对立面而提出的一种恐怖政治的奴隶制(孟德斯鸠《法的精神》)及其与之相伴随的停滞社会(亚当·斯密《国富论》),它只是一种世界史的开端(黑格尔《历史哲学》序言)。这种观念对于日本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在战前的研究中,不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是不言自明的。‘专制’和‘停滞’可以说是同义语”。^⑦

① 矢内原忠雄「支那問題の所在」、『中央公論』1937年2月号。

② 野沢豊「『中国統一化』論争について」、『アジア經濟研究所編「中国統一化」論争の研究』、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71年。

③ 石田浩「中国農村社会經濟構造の研究」、『晃洋書房』、1986年、10—11頁。

④ 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岩波書店』、1973年。

⑤ 清水盛光「支那社会の研究」、『岩波書店』、1939年。

⑥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371頁。

⑦ 中村哲「東アジア専制国家と社会・經濟」、『青木書店』、1993年、52頁。

过于强调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结果,就是出现了为日本对外侵略辩护的论调。谷川道雄就指出“按照这种想法,就导致这样一种理论,即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和领导,中国的近代化是困难的。其结果就是要把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进行正当化。”^①永井和也指出“在战争期间,‘亚细亚停滞论’的作用就是已经成为要使日本对亚洲侵略正当化的意识形态,在亚洲唯一成功进入近代化、维持了独立的日本,要从欧美列强的统治下保护那些自己无法形成近代化国家的亚洲诸民族,代替欧美而成为亚洲的盟主,具有领导和统治其他亚洲诸民族的权利。‘亚细亚停滞论’为这种‘东亚新秩序论’以及‘大东亚共荣圈论’提供了历史学的依据。”^②

但是,这种观点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还离不开近代日本社会的土壤。近代日本实行“脱亚入欧”,学习西方,成为军事强国之后,便开展了对邻国的侵略。厌恶和蔑视亚洲其他国家的观念盛行,这是接受和形成这种顽固的“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社会历史原因。正像福泽谕吉那样,把近代化仅仅看作是西洋化,而在亚洲推行近代化,就是要实现日本化。当推行日本化遇到了抵抗,福泽就主张:既然那些亚洲国家顽固不化,日本就应不惜以武力来促进其开化^③,甚至说“不要对中国文明寄予希望”了。^④小谷汪之曾经深刻指出“由于日本近代所走的道路,就规定了欧洲的近代价值观把我们深深地像咒语一样束缚起来。”^⑤欧洲中心观念的全盘接受与对外扩张、侵略亚洲的历史选择相结合,就为中国和亚洲“停滞论”在日本的发展提供了充足条件,这一点在十五年侵略战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中国社会停滞论”与“大东亚共荣圈”

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对此,当时既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又倡导国家主义和全体主义的代表性学者秋泽修二是这样说的“此次日华事变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光明的结果。也就是依靠皇军的武力将中国社会中那些被称为‘亚细亚的’停滞性政治支柱的军阀统治,从中国广大的主要地区扫除掉。由此,可以最终克服中国社会那种特有的停滞性,与前进自立的日本合作,开拓出获得真正自立的道路,这就是东亚协同体。”^⑥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都持有这种“中国社会停滞论”的观点,他们把对中国的入侵称之为是来拯救中国,把日本与西方列强在亚洲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说成是为了解放亚洲,狂妄宣称只有日本才是亚洲的领导者,要以日本为首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九一八事变的主谋者之一石原莞尔在《满洲建国前夜的心境》中说道:通过观察当时中国政局,“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政治能力不得不怀疑。汉民族虽然具有高度的文化,但建设近代国家大概是不可能的。在满洲事变前我们就一直有这种怀疑。我们都强硬地主张当时解决满蒙问题的唯一方策就是占领满蒙,由于汉民族自身不具有政治能力,所以要由日本来占领满蒙,这不但是日本存立的需要也是中国人自身的幸福”。^⑦1930年7月石原曾对资源局事务官横山勇说“中国不能统

① 谷川道雄『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12—13頁。

② 永井和『戦後マルクス主義史学とアジア認識——『アジア的停滞性論』のアボリア——』、古屋哲夫編『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

③ 家近亮子『日中関係の基本構造』、晃洋書房、2003年、47—48頁。

④ 福沢諭吉『新訂 福翁自伝』、岩波書店、1999年、262頁。

⑤ 小谷汪之『マルクスとアジア』、1979年、222頁。

⑥ 秋沢修二『支那社会構成』、白揚社、1939年、转引自子安宣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きたか』、藤原書店、2007年、141頁。

⑦ 石原莞爾『満州建国前夜の心境』、稻葉正夫他編『現代史資料 11 続・満州事変』、みすず書房、1975年、630頁。

一 拯救中国民族的天职是日本。”所以“要赌上国家的命运救济可怜的东洋各民族。为了拯救中国,其根据地就是满蒙,在满蒙的共同敌人是军阀,日华满鲜四民族要共存共荣。日本进行统治并有大企业,中国人劳动并有小企业,朝鲜人种水田,蒙古人从事畜牧业。要打破妨碍我们实现这种天职的白人压迫,这就是日美战争”。^① 1935年8月,石原提出“皇国现在的国策就是对外完成东亚联盟,对内坚决进行革新,由此完成实现八纮一宇的天皇统治计划的准备。”^②他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停滞的,自身不能建立起近代国家,所以要由日本统治,建立天皇统治的“八纮一宇”的世界。

对于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松井石根曾狂热主张结成“亚洲联盟”,理由是中国正在走向“堕落”,并会牵连到日本,所以日本决不能袖手旁观。他把日本出兵中国说成是对中国进行挽救。松井在《亚洲联盟论》中就说“如果中国依然执迷不悟,继续拒绝日本的援助之手,中国就会被分割或共管,成为国际纷争旋涡的第二个巴尔干,或者赤化为第二个苏联。”“虽然中国的没落是咎由自取,但由此受到打击的是日本和亚洲全体,所以日本要坚持,对于中国的自掘坟墓和日益堕落深渊决不能袖手旁观。”^③日本陆军中的所谓“中国通”佐佐木到一也说“东洋祸乱的根源在中国,其原因主要是西力东渐和中国的积弱,积弱的中国企求利用西力却往往使得祸乱更大。然而,受害最大的是我帝国和中国民众。必须如实告诉他们我们赌上国运而发动日俄战争的史实。”^④把日本与列强在中国的争夺说成是日本对中国负有责任,要中国只能服从日本,由日本独占。

1934年4月17日,日本政府发表天羽声明,十分露骨地说“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也许与其他外国不一致,这是由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使命所决定的。”中国的统一和恢复秩序是日本所希望的,“但是,中国的保全统一以及秩序的恢复,不外就是等待中国自身的自觉和努力,正像过去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现在也是一样,将来也不会发生变化”,所以日本应该有所行动。^⑤战争期间日本精神动员中央联盟,就强调日本国民必须要具有作为东亚领导者国民的自豪和自信。^⑥亚洲国家停滞不前,需要日本出来拯救和领导,这就是近代日本由中国和亚洲社会“停滞论”所演变出来的“侵略有理”谬论的强盗逻辑。

在战争期间把这种“中国社会停滞论”发展到高峰,并积极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提供理论依据的当属平野义太郎。平野生于1897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即留校担任助教、副教授。平野早期曾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科学团体“讲座派”的重要成员,著有《法律上的阶级斗争》、《最近的殖民地政策与民族运动》等论文,并从事《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的编辑工作。在“共同体”理论引入日本的过程中,平野翻译了魏特夫的多部著作,其研究观点也深受魏特夫的影响。他首先认为构成亚细亚社会基础的是家族共同体的顽强存在,特别是中国南方大家族“同居同财”的宗族制度。他主张这是分析和认识中国农村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次,他提出治水和灌溉事业与封闭、孤立的农村共同体有着密切关系,而由此形成的中国农业社会只是同一种社会形态的反复再生,看不到其螺旋式地向前发展,特别是其工业的发展更是明显停滞。

1930年7月12日,平野由于同情日本共产党而被起诉,同年被东京帝国大学免职。^⑦在“讲座派”被镇压的事件中平野又被起诉,转年以暂不起诉获释。此后,他便积极参加太平洋协会的活

① 石原莞爾「横山資源局事務官に示せる石原私見」、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編『現代史資料7 満州事変』、みすず書房、1975年、133頁。

② 石原莞爾「無題」、島田俊彦、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みすず書房、1976年、668頁。

③ 松井石根「亜細亞連盟論」、『外交時報』第679号、1933年3月。

④ 佐々木第九師団参謀長私見「満州建国と帝国の使命」、稻葉正夫他編『現代史資料11 続・満州事変』、633頁。

⑤ 「天羽英二情報部長の非公式声明」、島田俊彦、稻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8 日中戦争1』、25頁。

⑥ 井上寿一「理想だらけの戦時下日本」、筑摩書房、2013年、196頁。

⑦ 武藤秀太郎「平野義太郎の大アジア主義論 中国華北農村慣行調査と家族観の変容」、『アジア研究』49巻4号、2003年。

动。太平洋协会是战前由鹤见佑辅创立的一个“国策”研究机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则全面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平野曾担任该会的计划广告部长,是主要干部之一,据说在当时太平洋协会的各个委员会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①这时的平野已经由一位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者摇身一变而成为支持日本发动战争的理论家。战争期间,平野还参加了著名的“北支农村惯行调查”(当时日本称华北为“北支”)。依据对华北农村的调查资料,平野对中国农村的“共同体”性质有了进一步认识。

“北支农村惯行调查”是战争期间不多见的带有一定学术色彩的大型调查。当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及关内地区之后,为了制定殖民地政策曾组织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调查项目。例如,《满洲旧惯调查》、《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河北农村调查》、《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江苏省农村实态调查》和《广东省农村实态调查报告》等。“北支农村惯行调查”是在1940—1944年间由满铁调查部北支经济调查所(主要成员有杉之原舜一、安藤镇正、内田智雄、旗田巍等人)和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及有关学者(主要有末广严太郎、平野义太郎、仁井田升、福岛正夫、戒能通孝、内田力藏、矶田进、德田良治等人)共同进行的调查。

这项调查与日本以往的调查有些不同,虽然日本政府要求为殖民统治服务,但调查的主持者却带有一定的学术研究目的。他们当中许多人抱着确认中国农村共同体是否存在这个目的从事调查,但实地调查的结果是,绝大多数人否定了在中国有共同体的存在。当时的东亚研究所在制定“北支农村惯行调查”第一次预备调查项目中列出许多有关共同体习惯行为的项目,但经过调查却不得不承认在华北没有这些习惯行为,并在制定第二次预备调查项目时取消了有关共同体的内容。^②参加过“北支农村惯行调查”并专门承担村落社会结构专题的旗田巍回忆说“战争期间在中国各地农村所进行的实态调查,是一个对以前所议论的共同体理论进行验证的机会。当时我虽然认为共同体理论有不足之处,但是依然想定在中国有共同体的存在,利用参加满铁农村实态调查的机会来寻找共同体的实际状况。后来我否定了村落共同体的存在,但当初是预想其存在的。不过,随着调查的进展,便放弃了当初的预想。”^③这可以说是他们农村调查的最主要收获。

就战前日本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共同体”理论研究的总体而言,主要是在理论层次对共同体问题进行解释和阐述,其实证性研究十分薄弱。在中国史研究者中所展开的争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共同体存在的观点,其实证性的努力都没有得出有说服力的结果。^④虽然战争期间所进行的农村实态调查获得了大量资料,但通过详细分析这些资料而对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所得出的重要成果都是在战后出现的。^⑤

① 鈴木麻雄「第二次大戦下におけるマルクス主義者の言動——平野義太郎の大東亜共栄圏論——」、中村勝範編著『近代日本政治の諸相——時代による展開と考察——』、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1989年。

② 古島和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研文出版、1982年、13頁。

③ 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岩波書店、1973年、序に代えて。

④ 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5—6頁。

⑤ 例如 福武直『中国農村社会の構造』(大雅堂、1946年)、根岸信『中国社会における指導層——中国耆老紳士の研究——』(平和書房、1947年)、内田智雄『中国農村の家族と信仰』(弘文堂、1948年)、村松祐次『中国経済の社会態制』(東洋経済新報社、1949年)、仁井田陞『中国の農村家族』(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52年)、天野元之助『中国農業の諸問題』(技報堂、1952年)、今堀誠二『中国の社会構造』(有斐閣、1953年)、内田智雄『中国農村の分家制度』(岩波書店、1956年)、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岩波書店、1973年)、石田浩『中国農村社会経済構造の研究』(晃洋書房、1986年)、内山雅生『中国華北農村経済研究序説』(金沢大学経済学部、1990年)、柳沢和也『近代中国における農家経営と土地所有——1920—30年代華北・華中地域の構造と変動——』(御茶の水書房、2000年)、祁建民『中国における社会結合と国家権力——近現代華北農村の政治社会構造』(御茶の水書房、2006年)、内山雅生『現代中国農村と「共同体」——轉換期中国華北農村における社会構造と農民』(御茶の水書房、2003年)、内山雅生『日本の中国農村調査と伝統社会』(御茶の水書房、2009年)。

不过,在战前以平野为代表的一些人通过参加这项调查活动,反而更加坚持主张中国存在共同体的观点。平野所关心的重点在于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现属北京市顺义区)等村落的“会首”“村公会”等,认为这就是共同体的表现。1941年,平野发表了《会·会首·村长》^①一文,认为由会首们举行的聚会协商形式即村公会是自然村落的自治机关,这与政府制定的保甲、邻闾等行政组织不同。村公会以村庙为中心,具有自己的财产。这种村公会在清代就存在,并不是由政府设立的,因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生活共同形态,这就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础即共同体性质的组织。

同平野一起参加“北支农村惯行调查”的戒能通孝,虽然同样也是依据“北支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却对平野的观点提出异议,由此产生了著名的“平野—戒能”论争。戒能通孝在《中国土地法习惯序论》^②中,通过对日本和中国村落的比较,指出中国村落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没有像日本农村中的村落租税承包家族,因而也没有以他们为核心的村落组织的团结协作,村民是作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而存在的,中国村落中的村长以及会首并没有获得村民内在的支持,仅仅是个强力的统治者而已。戒能还认为,在对中国农村调查时所使用的“自然村”一词并不恰当,因为日本学界使用的“自然村”概念不仅仅是指人们的聚居,而且还意味着一个团体、一个组织,即一个内在统一的村落,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对于戒能的批评,平野又发表了《作为华北村落基本要素的宗族和村庙》^③,虽然接受了戒能的一些观点,承认日中村落间的差异,但是,他仍然强调中国村落中存在着很强的共同体性质的关系。他说,中国村落是以村庙信仰为中心而进行活动的,村民们关于是非善恶等意识规范的根源来自于对村庙主神的信仰意识。平野是想通过村民们的信仰和道德方面的共同意识行为来揭示村落共同体关系的存在。^④其后,平野还发表了《规范华北乡党社会生活的民族道德——以功过格为中心》^⑤,继续强调村落规范意识的同一性,以此证明共同体的存在。

平野为何对于中国农村共同体这样地“顽固坚持”呢?这与他当时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态度有关。平野认为,世界各国本应该和睦相处、和谐共荣,但近代以来亚洲各国由于受到外来的侵略与压迫产生分裂,为求得安定而出现战争,所以,亚洲各国应以日本为中心,团结一致,为了“东洋的道义”而战,由此他便对日本发动的战争进行合理化论证。作为一名学者,平野要从理论和历史上论证日本发动战争有其必要性。在《大亚细亚主义的历史基础》^⑥一书中,平野指出,大亚细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东洋共通的客观社会基础之上,这种社会基础就是“乡土共同体”,而村落自治、家族组织、宗族团体、看青会、乡党和同业公会,以及道教的宗教伦理观念等就是其具体表现。他认为以家庭观念为基础的家族结合,使人们的生命、命运协同为一体,这就是东洋的道义;以亚细亚的农村共同体为基础,由家族制度构成社会的结合单位,这就是东洋社会的本质;保证和维持村落共同体和家族共同体,重视这种共同关系是亚洲社会与欧美社会的本质区别所在,这也是日本对亚洲其他民族进行统治的根基。欧美社会自希腊、罗马时代开始就是一种个人主义、自由竞争的社会,征服与统治、对立和抗争是其本质。

① 平野義太郎『大アジア主義の歴史的基礎』、日本評論社、1945年、第2編第2章。

② 戒能通孝「支那土地法慣行序説」(1942年 内部打印资料) 其后收入東亞研究所編「支那農村慣行調査報告書」第1輯、1943年。

③ 平野義太郎「北支村落の基礎要素としての宗族及び村廟」、東亞研究所「支那農村慣行調査報告書」第1輯、1943年。

④ 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40頁。

⑤ 平野義太郎「支那における郷党の社会協同生活を規律する民族道德——功過格を中心として」、『法律時報』15卷11号、1943年11月。

⑥ 平野義太郎『大アジア主義の歴史的基礎』。

对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局,平野认为汪精卫政权继承了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与日本合作,符合东洋的道义;而蒋介石政权却与美国合作,造成“东洋的祸乱”。对于如何巩固汪精卫政权,平野从中国社会的特征出发提出村落建设的主张。他说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包括以下层次:以家族为单位的自然村落——以集市为中心的部落联合(乡村)——在农村的小都市,有商店,位于交通要冲,是农村和县城联系的媒介(镇)——农村的行政、经济以及文化的中心,乡土社会的边界(县城)。村落是乡土社会的基础单位,也是“大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重点。在乡村中由于共同体开始解体,同族集团的村落向地缘集团转化,乡绅成为村落权力的核心。所以,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就是要改造和利用乡绅,以此来实现“大亚细亚主义”。

近年就有日本学者批评说,这时平野的“亚细亚论”已经蜕变为“大东亚共荣圈论”。他支持日本政府的侵略战争,要建立一个由日本领导的所谓亚洲新秩序,丝毫不隐瞒对于亚洲其他民族的歧视。^①这标志着日本对于战争期间意识形态研究的深入。

当时与平野展开争论的戒能通孝,否定中国农村中所谓共同体的存在,其深层意思是反对平野那种反西洋、反近代的观点。^②戒能是肯定近代市民社会的,通过对中国村落土地私有权的考察,他否定了平野的共同体理论。正如对“平野—戒能”争论做出精辟总结的旗田巍所指出的“在二者意见对立的背后,存在着对于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亚细亚社会和西洋社会的位置如何看待,以及对于世界发展的瞻望、认识上的重大差异。”^③

戒能通孝虽然批评了平野关于东亚社会性质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村没有所谓的“共同体”,只有“个体”的存在,但他又指出这种个人主义性质的社会与日本和欧美社会仍然不同,依然难以发展到近代社会。他的看法是,在华北农村内部没有形成由自发的共同意识所支撑的一般秩序,虽然从外面看其土地所有权具有近代性,但其实质上缺乏近代性的本质。因为近代的国民秩序是在与封建领主进行权力对抗的农村协同组织中产生的,而中国农村没有西欧和日本那样的作为自主的公共权力机关的封建制和庄园制。其结果中国农村也没有形成由协同组织构成的村落秩序,也就不会形成协同团体性质的国民秩序。戒能通孝的这种认识虽然否定了中国存在“共同体”的推测,却又落入了“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窠臼。有趣的是,这时的平野反而开始批判所谓的亚洲社会“停滞论”,认为这种观点是一种要让亚洲永远处于西欧社会之下的偏见。^④

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共同体”理论与中国和亚洲社会“停滞论”发生了脱节,这一点值得注意。野泽丰对战前日本亚洲认识中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性曾有过深刻分析,他指出,在战前日本的亚洲研究中有一种包括自己在内都落后于欧洲的潜意识,在克服这种意识的努力中,“有时要追求一种普遍性(世界性),有时又要追求一种特殊性(土著性)。在对于特殊性的摸索中,关于亚洲是落后的固有看法和可变的看法都带有各自的特性。对于亚洲是侵略还是连带的这两种动机,也同对于亚洲是固定不变还是可以变化的两种认识深刻关联”。^⑤

日本学界在战争期间出现了这样一种奇妙的现象,一些原本主张“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观点的学者转而支持发动战争,而那些崇信西方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则比较消极。平野在早期是属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他从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的论述中却引导出“大亚细亚主义”,这可以说是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一个悲哀。但是,战后日本有学者主张这是马克思主义

① 鈴木麻雄「第二次大戦下における—マルクス主義者の言動—平野義太郎の大東亜共榮圏論—」。

② 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論」,42—44頁。

③ 旗田巍「中国村落と共同体理論」,序に代えて。

④ 平野義太郎「大アジア主義の歴史的基礎」,13—14頁。

⑤ 原覚天「現代アジア研究成立史論—満鉄調査部・東亜研究所・IPRの研究」,勁草書房,1984年,4頁。

理论本身的问题,认为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理论根据来源于马克思的观点。例如,谷川道雄就认为“马克思所提倡的东洋专制主义理论,指出了在其国家的深层存在着缺乏社会发展契机的村落共同体。另外,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古典奴隶制、封建制、近代资本主义几个相继发展历史阶段的最初阶段。由此,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论成了中国社会‘停滞论’的理论根据。”^①

中村哲和竹内好也认为战前日本的中国观受到了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和唯物史观影响。中村说道“共同体学说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欧洲中心史观和近代主义的立场上,以前近代特别是亚洲的前近代共同体作为普遍存在的这一先验论的看法为前提的。”^②竹内则指出“被输入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人的对中国认识上,发挥着使这种蔑视感固定化的作用。为什么呢?是因为接受了以生产力这一单一的物质来简单地对待历史,形成了把价值量化的决定论。学者们把中国如何落后于日本这件事进行‘科学的’证明,也就是将朴素的蔑视感确立为科学的蔑视感。这种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观,客观地看是从理论的方面帮助了日本的侵略,这一点是不容否定的。”^③

不过,依笔者看来,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是由其所走的对外侵略道路所决定的,并不能记在马克思主义的账上。马克思曾经对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暴行进行过严厉批判,同情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抗,这些观点为什么没有被当时的那些日本学者引用、坚持呢?出于自身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任意的解释和推演,突破了学术探讨的范围,这才是“中国社会停滞论”在日本产生并成为其对外侵略借口的根本原因。

最后,我们可以归纳出战前日本的中国观所具有的如下特点:第一,战前日本的中国观离不开国际学术发展的大背景,日本学者较早地引进和使用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中国研究,起到中西学术桥梁的作用。当然,日本的这种中国认识也会把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加以接受甚至放大,并同样以一种优越感来认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自己首先沐浴欧风美雨,反过来就认为自己比亚洲其他国家高出一等。第二,战前日本的中国认识虽然吸收了西方学者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在日本的进一步发展却离不开日本国家政策和国际环境,特别是当时日中两国关系的影响。西方的“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却转化为“中国社会停滞论”,进而成了为侵略战争辩护的工具,就说明了这一点。长期以来,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执着地“脱亚入欧”的日本,在中国认识的深层次里都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停滞论”和“专制论”的观念。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已经给予“停滞论”以沉重打击,那么其“专制论”的意识还深刻残存,从其所谓的“价值观”外交中不就可以看到这种顽固观念的影子吗?

(作者祁建民,山西省“百人计划”特聘专家(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谷川道雄『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12頁。

② 中村哲『東アジア専制国家と社会・経済』、29頁。

③ 竹内好『日本人の中国観』、『展望』1949年9月号,本文转引自永井和『戦後マルクス主義史学とアジア認識——「アジアの停滞性論」のアポリア——』。